

试论防风神话传说

防风氏神话传说的历史记载不多，研究起步较晚，论述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结合吴越民俗调查心得，综合与防风氏祭祀有关的民俗事象，写出此文，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祖先的神话传说

以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为代表，历代的史学家，大多将禹作为越民族的祖先，即所谓“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那么，大禹真是越的始祖吗？

早就有人怀疑。《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臣瓚还以为：“越为半姓，与楚同祖，故《国语·郑语》曰：‘半越，然则越非禹后明矣。’”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一书，则对司马迁“越为禹后”观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引《墨子·非攻下篇》的“越王鬻弓，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又引韦昭《吴语注》的“句践，祝融之后”，以为“然则越非禹后明矣”。

现代大量发掘出土的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系统，说明杭州湾、太湖流域，有一个早于大禹，不同于大禹所代表的华夏文化的另一个文化体系。

那么，吴越地区的始祖究竟是谁呢？

这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然而，今日在吴越腹地发现流传几千年的口碑——防风氏神话传说，引导我们认真注意防风氏及穿胸民的记载。其中如：

穿胸国。昔禹平天下，会诸侯会稽之野，防风氏后至，杀之，夏德之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还。至南海，经防风。防风氏之二臣，以涂山之戮，怒而射之。迅风雷雨，二龙升去。二臣怒，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

乃拔其刃 疗以不死之草 是为穿胸民(晋·张华《博物志·外国》)

防风氏身長三丈 刑者不及 乃筑高塘临之 故曰刑塘(《会稽郡故书杂集》
辑《贺循会稽记》)

武康归为上县，本为禹贡扬州之域，天文斗牛分野，盖古防风之国也。(乾隆
《武康县志》)

夏诸侯汪芒氏，即防风氏，建国封、隅二山之间。《国语》注：封、隅二山
在吴郡永安县。隅，今作禺；封山在二都封山里，禺山在杨坟。(乾隆《武康
县志》)

上述记载清楚地告诉人们，秦汉以前，扬州会稽郡有个防风氏国，从此地辐射出防
风氏、禹诛防风和防风国臣为防风复仇的神话传说。这神话传说，首先被相传成书于
战国时代的《国语》所采录，西汉的司马迁又加以删节，记入孔子传记。晋代的张华、
南北朝梁时的任昉，则直接根据民间传说。曾任会稽长官的贺循，又根据会稽的地名
传说 将“刑塘”故事列入《会稽记》。而乾隆《武康县志》的编纂者 则是既根据上述
记载，又根据武康(今湖州市德清县)地方的民间传说，糅合编成地方志。很明显，在
上古神话传说领域(亦即传说历史)中，存在一个独特的防风国或防风氏部落。

这个“国”或部落，今人钟伟今等根据民间传说的指引，在德清县二都乡、三合乡
找到遗迹，这就是二都的封山和三合的禺山。还有晋代元康初(291)年武康县令贺循
所建的“防风氏祠”。此祠俗称“防风神庙”由五代吴越王钱镠重新修建，号为“灵德
明王庙”。庙碑和碑文都已找到。

这个“防风国”“防风神庙”的遗址与历代的地方志记载和地方民俗相一致。如
司马迁《史记》有“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句 宋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九
七一说：“防风氏庙在武康县东南封、禺二山之间 祀夏时防风氏之神。”清代李亨特
重修《绍兴府志》卷三六：“防风庙 嘉泰会稽志 在县东北二十五里 禹诛防风氏 此其
遗迹。”明代万历《湖州府志》转引吴康侯《封山记》：“封山麓为防风庙。晋元康初 邑
令贺循建。吴越王钱镠微时，禱之有验，后封灵德王，其碑碣犹存。洪武四年敕封防风
氏之神。”现在找到的遗址与上述记载吻合 而“灵德王庙碑”仍在庙废址 碑文 钱镠
撰写 已在清陆心源著《吴兴金石志》中找到。

当地乡民清晰地记得庙毁于1947年农历八九月间 并提供了塑像、大殿等原有面
貌及一年一度祭防风氏的日期和盛况。连1948年重塑防风氏像时，发生了是根据典
籍塑“龙首牛耳连眉一目”，还是按钱镠时塑“祖先神”原貌的争论，也清晰地提供出
来，可见，从吴越王钱镠起，或者更早，当地人民是把防风氏帝王打扮(就像绍兴禹王
庙的大禹)为“祖先神”的 即按祖先的形象塑造 改变了“龙首牛耳连眉一目”(当地
称“单眉独眼”)的怪异形态。

近来又有周国荣《吴县望亭先秦越月城初探》谓“干人、吴人、越人散居长江中下游地区”；“古望亭地区乃古干夷人居住的一块基地，汪芒氏（即防风）为干人古称”。即有以“干”字为地名的遗迹，在吴地太湖流域。

我们知道，到越王勾践的时代，越已占有“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北至于御儿（今嘉兴），东至于鄞（今鄞县），西至于姑蔑（一说太湖，一说衢州）”（《国语·越语上》）。而勾践的祖先，原居住在今诸暨县界绍兴的今枫桥镇一带谷地，经过漫长的年代，向绍兴方向移动，逐渐进入“稍有君臣之义”的文明社会。《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述：“馮始受封，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宇庙祭祀之费。”“无余传世十余，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十有余岁，有人生而言语……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后。”这是从大约公元前二千年到五六百年的於越面貌的反映，说明了越曾经历较长的新石器时代，缓慢地向奴隶社会过渡。同时，地域也不断扩大，并吞或融合了许多部落。不管於越民族后来怎样“附会”到夏民族去了，於越民族融合了许多原始部落总是一个事实。居住在今德清县、余杭县交界处的防风氏部落，就是被於越民族兼并的。所谓“禹诛防风”，只是兼并的一种信息。而这似不可能发生在春秋时代的“越灭吴”，以至干人在吴地消失。也就是说，即使干人即防风氏，它被越并吞而不是被吴国并吞，而且地望的可能性应在太湖南包括德清县境。



德清县二都防风氏神庙（南朝防风祠）

祖先传说，作为古代文化信息，随着历史记载的扩散和人民的流播，融进华夏神话系统不足为奇。同样，在浙江原於越范围内的绍兴、杭州、金华等地流传不息，也不足为奇。融合各民族、各部族神话，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是民族文化形成的普遍现象和规律。

总之，防风氏神话记载和至今仍在流传的神话传说，及德清等地的相关事俗事象，都说明它是於越民族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部族的祖先传说。

二、防风氏神话传说的根基：治水和稻作生产

在我国治水英雄神话体系中，产生于黄河流域的共工、鯀、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英雄的神话比较系统，在典籍中的记载也很多。然而，正当距今四千年左右於越民族形成之际，整个中国大地正经历“夏禹洪水期”，也就是说，当时长江下游的太湖乃至钱塘江口一带，也是洪水“浩浩兮怀山襄陵”的。吴越地区现代发掘，表明这里在距今四千年至三千五百年之间，出现了文化“断层”，即继良渚文化后出现的马桥文化，出土面貌与前期完全不同：“前为大量玉器而无铜器，后有小件铜器而几乎没有玉器；前者石器很光，后却粗砺，前者多灰黑陶，后者多红陶及几何印纹硬陶……前者器形上承崧泽文化，后者却含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因素。”^①并且“太湖地区许多良渚文化层上有淤泥及湖泊下遗址”，表明曾遭大面积水灾。除了肯定吴越地区曾遭到“夏禹宇宙期”洪水侵害外，对文化“断层”和迅速变异的解释是民族迁移，从良渚文化后来以石峡文化面貌出现于岭南，以及大量出现于长江以北的江苏海安青墩、新沂花厅、安徽定远山根许等地，说明吴越地区先民有向南和大量向北迁移的迹象。同时，在这若干百年内，中原文化系统逐渐南下占领太湖地区，这在传说历史上就是所谓的“泰伯奔吴”，实际时间比传说应当大大提前。至于勾践认禹为祖先（司马迁看法）虽也能反映中原民族南下，创造江南马桥文化的历史，但实际上正如《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所载“无余传世十余 末君微劣 不能自立 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各部族或於越祖先被融合 即所谓“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以至“禹祀”（应为越祀）断绝”了 融合了中原文化——不管是“泰伯”带来的还是“大禹”带来的。到了勾践前两代才恢复主权 自称“禹之苗裔”。

现在，仍不能肯定河姆渡文化的创始者——越族先民在“夏禹宇宙期”洪水等冲击下，有没有在吴越地区断绝。然而，从文化最本质的事实——稻作文化看来 文化系统仍是延续的，并没有断绝。也就是说，江南地区的马桥文化及其后继文化，其核心仍

叶文宪《中国国家之形成》，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是稻作文化。不仅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这一点，而且新发现的防风氏神话传说及相关民俗事象，也能证明这一点。

新发现的防风氏神话传说 其主要内容和情节 是治水和稻作生活 而且与鲧、禹、息壤(色土)、玄龟等神话故事交织在一起。绍兴、湖州一带流传的《防风治水》、《防风为何封王》、《防风井》、《防风塔》等，都反映太湖和太湖流域的来历。流传在湖州一带的《尧封防风国》和金华东阳一带的《王鲧治水》、《大禹杀防风》也反映了治水方法斗争。

三、防风氏部族的信仰

以上分析说明防风氏神话传说是吴越稻作先民的创世纪之一，具有反映该地区生产、生活习俗的意义。然而，防风氏神话传说的要素出自何种图腾和信仰？或者，产生防风氏神话传说的氏族或部族的主要信仰是什么？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防风神话记载与民间传说两者的共同要素。这首先是“长人”和“骨节专车”，不仅最早的《国语》有记载，浙江各地新发现的《十里湖塘七尺庙》、《防风治水》等都这么说，而且武康等地至今有“长得像防风介大”的形容语。自然，



德清县二都风山（一作封山、上有防风古洞）

“人的脚骨长七尺”“尸骨要用牛车装”……这一系列描写都是“前逻辑”的神话性思维，但都能说明“长人”不是人；“骨”也并非人骨。那么，这是什么“骨节”是什么东西被拟人化了？联系吴越地区的地貌和生物状况，回答只有大树和巨型动物两种。其次，共同要素还有祭祀中的“土木作其形”“龙首牛耳，连眉一目”和“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都使人联想到树、竹和龙、牛大型动物。再次，“禹诛防风”和“防风治水”又显示着防风崇拜的对象与治水和稻作生活有联系。究竟是什么呢？回答不能排除牛和树木，因为牛有耕田的功能，而树木有治水造田的功能。

这三个共同要素中，牛和树木可能性最大，但牛和树木在百越历史上没有作为图腾信仰对象的记载。当然作为文献著作，不可能收罗民族中各部族的图腾对象，因而也就不能否定各部族有过各种图腾崇拜物。所以，联系於越民族的一支——防风氏（部落）所处环境及其相关民俗，分析出它的信仰对象还是有可能性。

对于牛（或者水牛）是不是防风氏部落的图腾崇拜对象，我的意见是否定的。其主要理由是“牛耕”在江南稻田出现很晚，不会超过春秋战国时代，从河姆渡文化遗址直到越王勾践时代出土的耕作工具，都是骨、石制作，只能用人的手、足操作。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的江南，直到隋代仍处于“火耕水耨”阶段，描述稻作生产过程最详细的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也没有牛耕稻田的记载。总而言之，殷商以前的吴越地区没有出土文物和文字记载，能证明牛（或水牛）用于生产和水利事业。

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射到树木（包括竹）的时候，看到的情况就不大相同了。

首先，新发现的防风氏神话传说和《国语·鲁语》、《述异记》等文字记载及“干”字的甲骨文写法，都隐约透着树木崇拜的信息。

江南吴越地区的树木崇拜，具有深远的传统源流。宋代《太平御览》引晋·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意亲好合，即脱头上手巾解腰间五尺刀以与之交，拜亲跪妻，初定交有礼俗，皆当于山间大树下封土为坛，祭以白犬一母鸡一鸡子三……其坛他人畏不敢犯也。”在大树下封土为坛，那是视大树和土石堆为神明，即“神判”和向神起誓的原始思维方式，可见其源流之长。后代又演化出众多的树神、树精、樟柳神的神性传说，巫术采用桃枝、桃剑、杨柳枝驱鬼下神，屡见不鲜。树木崇拜在江南，至今有遗迹可寻，如古代勾践越国的腹地，至今留有桐乡、梧桐镇（以上嘉兴桐乡县）、双林、东林（湖州）、梅城、长林（建德县）、枫树岭、杨柳墟（淳安县）等等。至于樟村地名，则浙江全省每县都有。笔者近年访得淳安、临安县昌化区一带，历代山民定居前，都要择地种植樟、柏、榧等树木，以占卜地理的优劣，树木长势好，便在此处定居，树下建宗祠。有了疾病、灾厄，便向“树神”祭拜，为求吉利。病弱儿童“过房”给老树作寄子、寄女，取名带樟、柏、木、根等树木的意思。浙江临安县山区对古树名木的崇拜，则有寄拜（即寄子、寄女）治病、祭祀、除邪、做媒等方式，几乎每一棵大树下面都有神坛，树枝上挂满了“寄拜”木牌或字条，有的大树的“寄拜”牌有近百件之多。至于屋前后植竹木，作为“风水

树”祈求“家宅平安，子孙兴旺”，浙江全省比比皆然。有的还将新生婴儿的胎胞埋在树下，所谓“屋前树下埋胞衣”；有的叫小孩年三十夜里去攀登树木、竹竿，嘴里念：“竹娘娘，树娘娘，让我和你一样长……”可见他们对于树木神性的敬仰已成习俗。

江浙等地有如此深远的树木崇拜源流，那么，当地的古人，选择他们崇拜的香樟等木材雕塑偶像，就不是偶然的了。河姆渡古文化出土的榫、卯木构件，告诉我们吴越先民有七千年的木雕经验，用于“干栏式”房屋的建筑，而且木加工技术越来越发达，从制作木桨、独木舟，至建造大型楼船和木结构宫殿。这样，吴越地区出现许多能工巧匠，如建造全木结构高塔的喻皓，出现善作木雕神像的杨惠之（唐代），也就不属偶然。所以，信仰因素和工艺技术因素结合起来，终于造成江南神像“土木作其形”的传统习俗。

其次，新发现的防风氏神话群系，其主角是一位教民农耕、治理洪水的英雄，又是稻作部族的祖神，如果设想这是树木崇拜的产物，就必须回答树木在稻作及治水中的作用如何。其实答案能在吴越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找到，如“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的越人，山处离不开木结构干栏建筑，水行离不开木结构的船和楫；而稻作生产的工具，则更是离不了木头；蓄水放水的水闸（浙江叫碶、契），其挡水板也是木制的。就拿治水来说吧，我们不妨看一看吴越地区的传统经验，譬如在水深流急的地方，为了筑堤和护堤，人们都采用打一排、二排、三排木桩，这样抛石筑堤时可帮助抗浪，堤筑成后可缓冲水流。著名的钱塘江大堤，就是在吴越国时代筑成的，反映了该地区人民以木治水的传统经验。再如现在的昆山、嘉定、太仓一带，成陆较晚，直到唐宋时仍积水成浅湖，能成今日良田千顷的局面，也是当时人民运用传统经验的成果：“苏州至昆山县凡六十里皆浅水无陆途……嘉祐中有人献计，就水中以籐篾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丈，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籐篾中，候干，则以水车沃去两墙之间旧水。墙间六丈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以为堤……不日堤成，至今为利。”^①这种植木水中，实以树枝、柴草成透水墙，滤积泥土，取土为堤的方法，是吴越地区长期与洪水作斗争中积累的经验。

在与吴越地区古代人民的生死存亡有关的治水斗争中，树木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把树木作为治水神灵来崇拜和传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实，防风氏又被写成“汪芒”氏和“汪罔”氏，自有水中植木（或草）及“水中冲天而起”的含义，需要我们联系吴越古人的生活实际去破译。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就是联系祭祀防风氏的方式及相关民俗，研究防风氏的形象。前面已经解说了“土木作其形”的来历，此处尚需对“龙首牛耳，连眉一目”作出恰当的说明。我以为“龙首牛耳”只是一切怪异、神奇事象的写照，正像后来阴间的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三。

“牛头马面”一样，是人对神异事物敬畏心理的流露。至于“连眉一目”则更说明防风形象不是动物类的，而是抽象事物或植物，因为动物类图腾形象，不是动物本身，就是人面动物身，或者兽面人身。“连眉一目”的形象塑造，要么是传闻，要么是抽象事物或植物的写实。试想，哪里是树木的眉毛和眼睛呢？塑像者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树木又是神必须塑像，就采取“折中”的办法，来一个半人半树吧，塑成“连眉一目”的脸庞。

我们还应当重视湖州德清县等地祭祀防风氏的种种习俗表现。据考察，德清县防风祠，位于封山，即今二都乡的防风山南麓。防风氏神像为坐像，传说他治水奔波一生死于非命，需要“休息”就塑成坐像。当地春秋两祭，以秋祭最盛。届时均有庙会，演社戏，四乡男女老少云集，一连三天热闹异常。说明德清县（原武康县）的人民，是将防风氏作为开辟的祖神和治水英雄来祭祀的，直到解放初期，此地的庙会仍在举行。更值得注意的是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的情景，长期在绍兴、德清一带延续。如吴越民间每逢农历七月十五盂兰盆会时，入夜，道士吹起一种三尺长的号筒，发出“呜嘟嘟”的凄厉之声；一群道士披头散发，嘴里念念有词，边念边舞，朝拜阴间冤魂。民间传说这是古代祭防风氏舞的遗俗，道士跳的是防风古舞，吹的是防风古乐。道士吹的这种三尺长的发声“呜嘟嘟”的号筒，在杭、嘉、湖一带被称为“无常号筒”，绍兴方言称为“目连瞎头”。清代范寅《越谚》说：“铜制长四尺，是一种特别加长的号筒，道场及召鬼戏皆用，目连戏为多，故名。”可见这是近代仿制“截竹三尺，吹之如嗥”的防风氏乐铜号筒。而在浙西南深山，则有一种古朴的“山花桐”乐器，同样发出“呜嘟嘟”的如嗥之声。那是莫高同志亲眼目睹，据他说在1978年秋季的浙江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上，看到云和县代表在跳竹马舞时以一种器乐伴舞，看上去像竹筒，但畲族代表蓝荣清说，那是山区植物“山花桐”制作的，这种树木形似竹竿，笔直中空，砍下来吹会发出“呜嘟嘟”声响，至今云和县山里儿童在牧牛时常采制吹着游戏。笔者以为“山花筒”即原生于我国江南山区的树木“山桐子”是一种吴越山区、丘陵的野生植物，吴越古人很有可能采制作祭祀伴舞、招魂的乐器。然而，用竹木号筒来祭防风，也应含有以神性之物发出神性之声来召神、娱神的意义，这正如民间通神的工具如烛、香、楮、纸钱，都是来源于树木一样——如烛是乌桕树果所制，香是树皮所制，纸钱是纸是竹丝、树皮纤维所制，具有神性，也是神所喜爱的。这些都不是反证防风氏是树木的化身吗？

关于“三人披发而舞”的防风舞，也与防风氏有关。吴越民间招魂时道士“披发而舞”伴以“呜嘟嘟”的号筒之声，仍不失为其遗迹。绍兴等地还有一种祭祀界限，那就是官府沿袭典籍，春秋两季祭祀夏禹，但平民不同，他们有防风庙（七尺庙）等祭祀活动，却从来不祭大禹，还流传谚语说“平民不拜禹，拜禹要肚痛”。对照吴越地区祭防风、吹防风曲、跳防风舞的盛况，说明此地人民有自己的崇拜对象——“披发而舞”固

然是巫风的延续 但其特殊的伴奏乐器和‘披发’舞姿 令人想起树木在风声中枝叶狂舞的情景。

本文根据历代的文字记载和新发现的防风神话传说，及与此相关的吴越民俗事象，分析出防风氏是吴越地区距今四千年以来的丘陵与平原交界处某稻作部族的祖先传说，含有明显的树木崇拜印记。虽不能确认是何种树木，但从防风神话的形象及祭祀状况看 应是高大的乔木或竹子。论述有未尽之处 供专家鉴别。

（原载上海《中国民间文化》总第 15 集及安徽文艺出版社《防风神话研究》）

防风氏干越民俗初探

防风氏之称始见于战国时代成书的《国语》，载在《鲁语》中。而商代卜辞中已有“征东夷”的记述。成书年代尚不十分明白的《书·禹贡》中有“昔尧命羲仲，宅隅夷，曰阳谷”之句。至于干越、干吴、干国 的记载，春秋以来不绝如缕。苏州大学周国荣先生根据《越绝书》的记载，已经找到了“越干王城”的遗址，就在苏州望城的“月（越）城”。经过调查，周先生发现了墓葬、独木船棺等遗物，又证实了一批带“干”字的旧地名，如“捍村”、“干浜”等。

随着近年防风氏和干越研究的深入，探索防风氏——干越民俗的条件逐渐成熟。

一、地域文化的流变

《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干夷、黄夷、白夷、赤夷、风夷、阳夷。昔尧命羲仲：宅隅夷，曰阳谷，盖日所出也。”按照两汉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的方位推算，九夷居我国正东和东南海滨，即从齐（山东）南下直到广东、海南广大沿海地域。其中正东即黄河出海口南北齐地，晋代《枕中记》“太昊氏为青帝，治岱宗山”。唐兰先生认为少昊文化即当代出土的大汶口文化。

山东以南的东南夷，即《后汉书》所说的畎夷和干夷，居于东夷集团的东南方，即今太湖东和南，也就是江浙沪地区。从文化系统着眼，便是建德人——三山人——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亦即稻作——舟楫——印纹陶文化系统。

地域大致相同的畎夷和干夷，起先有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虽同属于河姆渡人后裔，但由于距今约七千年前的卷转虫海浸发生后显出分野。即有一部分在海浸时，向西逃避到会稽山南部四明山一带，其主要生产方式“迁徙农业与狩猎业”。据清代人毛奇龄考证，直到青铜时代（公元前六世纪）勾践才将国都建立在会稽山北麓冲积扇上，即今绍兴平水镇附近的“平阳”。至今尚能发现绍兴宁波一带，往往称平原、平地为“平阳”或“平漾”、“平洋”，可见“平阳”一词在越人中影响之大。另外，笔者淳安山

区调查表明此地“刀耕火种”及种稻不耘、不插秧等原始作业方式，多少带有“迁徙农业”遗风。勾践奖励生育措施有“赏犬一头”记载。越地至今有男孩戴“狗头帽”及畚人“狗王歌”表明“吠夷（田猎）生活的遗迹。

而居于浙西山麓和环太湖低山地区的一支，海浸时损失不大，相对完整地生存下来了。如马家浜文化有嘉兴马家浜、桐乡罗家角、吴兴邱城，远有吴江梅埭、吴县草鞋山、望亭越城、张陵山、常州圩墩及上海崧泽等。因为一万五千年前的海浸使太湖成为一片汪洋，开创马家浜文化的不可能是“三山人”遗裔，只能是向北向东发展的河姆渡人。马家浜文化特征仍是稻作舟楫文化，向后发展就是良渚文化，所谓“干夷”及传说中的“防风氏”产生在这一文化时期。

进入青铜文化时期即商周时代，太湖东向的吴县腹地有一个渔猎部族“虞（即吴）逐步强盛起来，但“干夷”已发展到宁镇地区，与原有土著居民可能是“三山人”遗裔相结合。到了周代初年，“干夷”与“吴”屡战，后来“干夷”战败，一部分渡长江在扬州一带建立邗国，一部分向南与北进的勾践於越（即“吠夷”）结合。在这个时期或稍晚些时间，“干夷”已称“干越”和“干吴”，这些部族的人向西发展到赣东北，形成“它们（指赣东北干人）和苏南、浙江及皖南地区自成一个部族系统，这个族系就是古代的干越。”秦汉时期，他们又向西发展，在湖北的神农架山地一带与土著居民结合形成土家族；在川东与土著结合为夔越。

二、主要信仰和图腾或族徽

在防风氏神话研究中，本人曾以《防风氏与树木信仰》为题，论证此部族的树木、树干图腾信仰实质。现再次补充论证。

在商代初期的甲骨文中，“干”字呈丫形，很像一根有权木杆，即干夷（干越）的图腾柱；或像人靠干或背干而跪，意似对干的崇拜。这就是商王武丁时“祭已卜干氏”、“干不其氏”和“犬干一名（乙 4680 反）”。在商后期，有另一形状的干字出现，从前后文的对照看，此记载的意思是商王娶了干越的女子为妻妾，此字为𠄎，似图腾柱立于通衢之中意义。笔者在《防风氏神话传说与树木信仰》中列举防风氏树木信仰的论据已有一些，甲骨文“干”字的例证堪作补充。还有：“浙江杭州的古荡、良渚、湖州的钱山漾（出土）石器中有戈、矛、钺，均为柄武器。”我认为这“柄”就是古代越人（包括防风氏）重视的“干”，并以带“干”的农具（如有段石镞）和武器（如石钺）与中原其他族系相区别。但到了商周时期，干夷防风氏的“干”图腾崇拜，已经影响了同一东夷集团、居于中原的商（殷）人，所以殷人也有了“柄武器”，以至周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杵者，兵器之“干”也。联系上述殷人国王娶干人为妻妾及封干人为武官的事



德清县二都防风氏神庙供防风氏雕像

向防风氏学来的。所以，防风氏图腾柱或族徽，顶端不必有鸟，柱面不必有蛇雕，实是一根带有二杈的树干（幹），正如商代甲骨文所示。绍兴铜屋模型等出土资料所显示的图腾物，乃是越民族综合信仰事象，其中只有“柱”本身是干夷防风氏“树”、“干”图腾物。直到今天，“百越”文化研究者未能确认越有干和树木信仰，只能确认鸟、蛇二者，其实是一种不应有的疏忽。而在东夷集团另一后裔苗族文化史研究中，已经确认“枫木”崇拜的事实。

事实上，秦汉以来我国各地尤其是江淮一带，以华表、表木为徽识的现象十分普遍。例如《周礼·肆师》“祭之日，表粢盛”。郑玄注：“故书表为剽。剽、表皆谓徽识。”《淮南子·主术训》：“舜立诽谤之木。”高诱注：“表木。”又如西晋崔豹《古今注》卷下：“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木，或谓之表木……秦乃除之，汉始复修。”又称“表门起于禹。禹治洪水……以纪其功。”《左传·昭公十一年》“会有表……会朝之言必闻于表

实，殷人中充分发展干越木加工技术，应不足为奇。

西周初年防风氏干越人又开创了木制防御工具“盾”，即“板盾”。所以，干越的迁徙区今江西出现“板盾蛮”之称的居民。“干”不仅有“柄武器”的含义，西周以来又有“盾”的含义，成了捍卫、保卫、守卫、防卫的代名词。诸如“公侯干城”（《诗·周南·兔置》）；“干吾王身”（西周《师询簋》铭文）。

有人以为立图腾柱是古代越人的普遍现象，并以1981年发现于绍兴的铜质房屋模型为证：“而这房屋的正中，高竖着一根图腾柱。其断面作八角形，通体装饰着花纹，柱顶立着一只大尾鸠。”我以为，立图腾柱是越人后期现象，即於越部族逐渐融合了干越防风氏等后，

著之位。”杜预注：“野会设表以为位。”又《宣公十二年》云：“逢大夫与其二子乘……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于是。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杜预注：“表，所指木。”所以，设木为表，识是夏商周乃至汉晋十分明显的图腾祭祀遗迹。

“设木为表”的图腾崇拜除派生出信仰、徽识、立誓等现象外，还衍生墓表、命名、仪仗等实物现象。这仍在干越人足迹所到的淮徐、赣东北等地较为明显，如《左传·哀公十六年》“吴人伐慎，白公败之。请以战备献。许之，遂作乱。秋七月杀子西。子期于朝……抉豫章以杀人而后死”。其中子期所“抉”之“豫章”为何物？今人陈江认为，“豫章必吴人灭徐掳获或群舒慎人守祠徐舒表仗”，也即“紫櫨”。宋王观国《学林》卷四考：“紫櫨者，天子征伐其礼仪中有物如徽识节旄。”“豫章”既为仪仗，则今南昌古名豫章，自然与此地盛行“表木”有关。前述赣东北是干越人移民方位，“表木”现象是“干”图腾之表现可明白无疑，乃至江右道家人物多名为“表”（如三国吴时干政的王表、道士，有飞升仙径的刘表、字景升），有“晋元康初炼丹山岩中”的“王表”及“王表岩”……乃至江右出现诨号“老俵”，当为“老表”之音转。而这种语义心理现象，又表现为徐淮地区的墓表、墓树。《史记·吴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季札来去不满一年，徐君墓树何得可挂剑之大？必是所谓“多列于庭”和“坟以梓木为表”的“表木”。

上述以表、表木为地名、道号和乡党称呼老俵、表的现象和观念，与吴越腹地以“干”为地名、王号及族称有广泛的联系，只不过前者发源于表——以树（干）为墓表、华表、祭祀象征；而后者直接源于图腾和族徽的干。所以，回顾起来，可以很明显地与河姆渡人对树木的重视相联系——出土的河姆渡榫卯构件和木桨、干栏式建筑，表明他们对树木的依赖不仅在生产中松土种植工具的柄，还在于住和行。依赖如此广泛，则产生敬仰以至崇拜为图腾，亦顺理成章。

扩展开去，则应充分注意到吴越腹地和越人移居区，至今存在众多的树木崇拜现象。如以树命名地、树“木主”、土木其形（萧梁时任昉关于防风氏纪念方式即江浙泥塑木雕）、香火通天、儿童摇木求长、树神庙宇、风水树等等。同时，也有必要指出树木崇拜发展为“干”族徽后的遗留物，如神话人物干将及传说地名莫干山，还有干乡、竿（干）山、望亭干浜、捍村、邗江等。这一系列地名的南端，正是被今人论为防风氏部属居地中心的德清县。而向北移动到吴县望亭的历史，又被望亭濒太湖地段的地名证实；再向北移动到邗江县历史，已有记载表明，地名亦能佐证。同样，干夷防风氏信仰随着向淮徐舒地区和江西地区的移动，由于“干”发展出的“板盾”及“表”，赣、汉代以来也留下比比皆是的遗迹。所以宋代有人以为古人有以树名称地的习惯，他列举酸枣、杞、桐庐、豫章等证之。现在看来，不仅杞、酸枣不能统而论之，桐庐、豫章亦非如此简单，而都是具有一定的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现象。

如此看来,传说中的干夷、防风氏,后来发展为干越、越干、邗国、板盾蛮、夔越,其图腾和族徽在殷商以前,应为树幹即干;可能是立干于街衢的意思,秦汉以后被徐淮、赣东北一带称为“华表”、“表木”或“表”,其实质还是树干、树木。即使诸多人士不识为何物的紫榭、豫章,亦即“表”即树干。总之,树干信仰上承河姆渡文化,下延至今的树神崇拜,是传说中的东夷集团和历史上的干越的图腾崇拜现象。

三、稻作生产方式与生产工具

防风氏——干夷(干方)——邗——越干,这一族系始终以稻作为主要生产方式。

防风氏神话传说的古籍记载,如《国语·鲁语》、《山海经》“穿胸民”、萧梁任昉《述异记》等,都透露了防风氏稻作生产与此息息相关的树木崇拜的信息。近年从金华、绍兴、杭州(主要是余杭县)、湖州(主要是德清县)箬地区发掘的防风氏神话传说,是“踢翻水盆成太湖”、“色土阻水”等内容也透露了这个部族的稻作生产实质。一系列保存到今天的防风氏传说的核心是治水,而且是以“堵”为特性,与中原“大禹治水”的“导”截然相反。究其底蕴,乃是稻作与旱作农业的种粟、种麦对待水的态度的分野。联系《周礼·地官·稻人》:“以渚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其中的渚、池和隄、堤、箬,活脱就是防风氏以堵治水的写照。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人,在南征东讨的过程中,向夷越各支学会了种稻和治水,以致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必须是善于治水的。《左传》:“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为令尹也”,其中孙叔敖蓄水和灌田的方法与防风氏“踢翻水盆”的传说,本质都是“以渚蓄水”的稻作生产经验。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卫聚贤先生十分注意马家浜——良渚文化的石器生产工具。他说:“浙江杭州的古荡、杭州的良渚、湖州的钱山漾,石器中有戈、矛、钺,均为柄兵器。”卫聚贤先生画有戈、矛以绳系柄之图,并引《左传》记吴王参加中原会盟时“王亲秉钺”,表明戈即钺即吴越之“越”本字,也是有柄石器。现在无论是河姆渡、崧泽、良渚诸文化的发掘,都发现有段石镰、石犁、石斧,作为生产工具,都需要系柄才能使用。拙见以为无论是卫聚贤先生所称的“柄”,还是今人论证的柄,都是用树干或树枝制成的杆,即干越的“干”。干夷、干越人的图腾崇拜也好,族名族徽也罢,总之是来源于生产工具及其崇拜。

《韩非子·二难》谓“蹇叔处干而亡,处秦秦霸”,《管子·小问》也有“昔者吴干战”记载干先胜后败的情形。看来,大约在公元前680年前后,吴王阖庐与干国有一场大战,到了公元前659—655年干国就灭亡了,蹇叔于公元前655年入秦受穆公重用。为什么会发生战争?干国的失败原因何在?从生产方式看,发端于太湖东向的吴

(虞)是以渔猎起家的 原始根据地约在今吴江、常熟一线 他们的部族壮大起来 只有向西或向北才能求得发展。以稻作为主体的干国，时以环太湖东南求发展，太湖是他们的水源，太湖东南低山地段是他们繁衍生长之地，吴的发展方向，必与干国作争夺。稻作部族和渔猎部族，都离不开水源和水面，这是吴干战争的主要原因。

经过近百年的争斗，干国终于失败，国人有远涉西北的如蹇叔一支竟达于陕西秦国；有近涉正北的一支后来在扬州一带建立邗国；也应有向西向南的，现在尚未考明而已。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以武器而论，我们已知道无锡的产锡之地时为吴国所有，所以吴国的青铜武器一定比干国精良得多。《管子·小问》说：“昔者吴干战。未龔不得入军门。国子尽龔其齿，遂入，为干国多。”除了初战时干国人的士气外，还可发现干人成丁礼“龔”，就是凿去一颗或两颗牙齿。从龔的字形分析，凿齿的工具是匕。而匕在河姆渡文化中由食器转化为祭器，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如出土雕刻精细的鸟形匕，显示出神秘意义。公元前七世纪的干国人仍用匕凿齿举行类似图腾装饰的成丁礼，表明他们乃是河姆渡的传人。干国人如果仍以匕为食器，那么他们所食就与河姆渡人一样的鱼稻；如果干国人已经把匕上升为祭器，那么他们必定是在“食鱼与稻”的物质基础上使匕升华的。从匕的存在可以推论干国人的稻作生产的必然性。

四、主要生活习俗

按现有的研究和调查及资料，干越防风氏在稻作生产和所处地理环境的决定下，有如下主要生活习俗。

(1) 向阳而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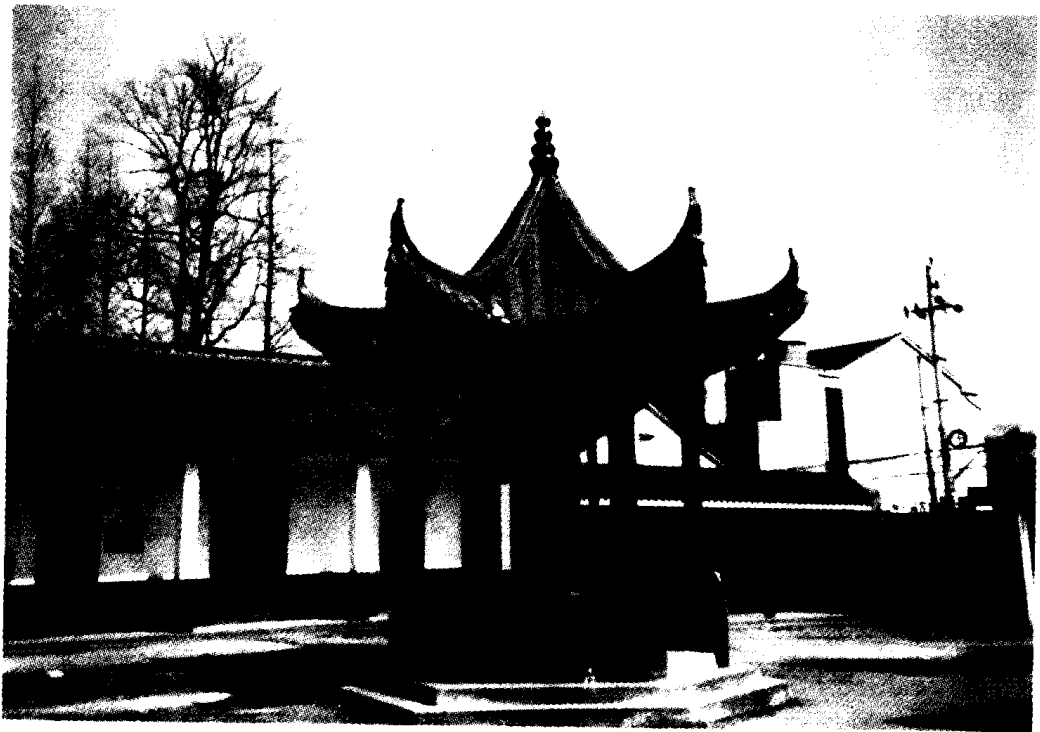
“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为漆姓（一为鼈姓）。为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一作犬人），”（《国语·鲁语》）“昔尧命羲仲，宅隅夷，曰阳谷，盖日所出也。”（《后汉书·东夷传》）上述记载隐约透露了防风氏居于山间平原、水滨向阳之地的信息。今人经多方研究，已发现太湖多处防风氏的踪迹。其中如浙江德清县（原武康县）三合乡封风、禺二山之间的防风洞、防风祠；江苏吴县太湖渔洋山汪芒鼈、汪芒坟；吴县望亭镇濒太湖有大小干山和很多干字地名如干浜、干头等，还有望亭镇的越城（即月城）经周国荣等考查认定是勾践时复辟的“越干王城”。拓展开去，浙江余杭县有防风遗迹；德清县有莫干山及莫干山长人坞；有防风草；上海青浦县有竿山（古代三泖九峰之一）；江苏句容县有上杆（村）；吴县望亭镇不仅有干头、干浜、捍村等地名，还有周国荣、周云飞等考确了的越干王城；扬州有邗江县名，等等。对上述各疑为防风氏及其后裔干越居住点，考察得比较细致的已有德清县三合乡和吴县望亭镇。三合乡的风山，高不足五十米，但此地遍布的孤山是接连莫干

山乃至天目山的，即天目山脉伸向东南平原的余脉；这一带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老人坑”流传着“十节尾巴九节黄”的“祖宗有尾巴”的传说，且至今下渚湖仍是一片水面。而风山与禹山之间是一片肥沃的平原，似不难想见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良渚文化的族系在这里躲避大水生存繁衍。何况南北朝萧梁时人任昉已有“防风祠”的记载。

至于吴县望亭一带的越干王城，东汉时就有“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县七十里”（《越绝书·吴地传》）之说。现在发现“干城”西为太湖和古称秦余杭山、阳山的山丘，中间有望虞河（古称蠡河）、运河和无名浜。考察此地的周云飞还发现：这里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往往都是靠近水域或适宜生产、生活的向阳高爽之地”。其后的东周时代的干城，显然筑土堆高，井的分布密集而呈线状。这些居住特点，不难想见干夷防风氏“宅隅夷，曰阳谷”即因稻作生产需要而靠近水源，居住丘陵边缘平原，面向太阳接受阳光照射的情景。而且，此地区是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商周文化交替和重复叠压的，表明这三个时期人类从未大规模灭绝过，直到进入中古秦汉时代，生存繁衍到今天。这就证明干夷防风氏神话，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2）鳩舌之言

典籍记载和考古发掘已证明生活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浙江中部及东部的，分别为吴、干越和於越。而这三个部族在那时已“同气共俗”（《越绝书》），那么，他们



德清二都防风氏神庙碑亭（内有五代吴越王钱鏐撰文碑）

中的干越防风氏有什么语言特点呢？首先，从现在的干、戇、夔诸字的音看，干越人自称为“邗”(han)不是现在的北方音“干”而近“旱”。因为只有如此，才会有春秋时逃亡的干国人中有姓为“蹇叔”、“寒”；才有扬州城南“邗国”、“邗江”地名，才会有各地上述干、竿、扞、捍的地名，其实是同一个“捍”音。其二，《孟子》以为吴越人“南蛮鴟舌之言”，今人考以“胶着语”现象，现在看来还要作补充说明。因为今人在解释中原典籍出现句吴、句践、於越等名称时，往往认为句、勾、於、干是胶着语的发语词。但我认为，从“干越”之称看，这种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即使吴越语言声母和韵母与中原人都不一样，也不见得词句中的第一个音字都是没有意义的发语音符。“干越”的“干”就是典型。所以我想，句、勾、於、干四个字就是上述“邗”音，那是吴(周国荣考为虎头鱼图腾族廬)占有“干”后，两部族合并，吴人始称“句吴”、“句吴”对原居住在四明山接连金衢盆地的越部族说来，首领始带“句”字的应为句践，那时越人势力已达嘉兴以北，部分“干”人进入越部族，所以同时称大越、于越；“于越”很有可能是“干越”的错简错铸。古籍有“於越”，“於”音乌，于越是错铸。其三，秦汉以前古籍经常出现戈、吴勾、干、干戚等等武器名称，其实戈、干、勾、干戚就是干，即柄武器，如戈即长柄青铜武器，干戚即有柄斧头。而其读音应为“邗”，一如《诗经》的“公侯干(捍)戚”。其四，据调查，环太湖的干越人聚居区，至今读旱为邗、捍之音，而读干为竿 gū，但原於越腹地绍兴浙东一带，有“旱(天不下雨)无干(以燥为干)，也不知“捍”为何物。这些现象似表明干与吴、越与干、越与吴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融合后，保留干夷的干字音为旱、捍、邗即 han。至于为何以干为旱之音，原因是东夷集团早就有太阳崇拜倾向。早在汉代服虔、臣瓚就以为“越为祝融之后”。现在，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的发掘，表明浙东和杭嘉湖一带，新石器早期和中晚期已有“双头鸟”、“日中鸟”等刻画和雕塑。唐兰先生所论的太昊氏文化的大汶口出土陶尊，有日在山上的象形刻划，山东莒县出土陶缸也有基本相同刻划；句践於越腹地有狗山(今名吼山)，传说是句践卧薪尝胆的地方，最东方向有一挺立巨石，石上复置一巨石，石尖朝向东方日出之处，附近有祭坛，今人论为越人“牂柯祭日”产物。今考防风氏和干越，在融入了於越和吴之后，保留了信仰共同体日，又保留了自身的“𠂔”刻划为“旱”是很有可能的。而其语音不变，仍是“邗”即“旱”的音义一致，且日久产生“捍”字，就是保卫(本族系)的意思。后人不察，使干、旱、捍、蹇、戇、夔等义音分离，都是秦汉以后的现象。

(3) 悬棺葬崖

直到今天为止，发现悬棺葬的地方，都是干人流徙之地，如闽北、赣东北、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等。然而，苏州望亭越干王城发现过独木船棺。本人在苏州吴县发现过横死者棺材一半在岸上一半伸进河里的现象。

(4) 匕箸兼用

食稻与鱼的干人，从以匕凿齿的情况看，他们是用匕作为食器者。后来就转化为